

國父 胡適 陸仲安

一八九二年，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以最優異成績畢業，應聘在澳門鏡湖醫院工作。這原是當地紳商公立醫局，向用中藥施治貧病，如今又開始在中藥施診之外，兼採西洋醫藥施惠貧民。如中山先生所指陳：「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則自中國有醫局以來，其主事官紳，對於西醫從未有正式的提倡。有之，自澳門始」。其後，中山先生在廣州東西藥局施診，醫術仁心，不僅口碑載道，更有報紙鳴謝廣告。但當時中山先生改造祖國心理日益迫切，「每日行醫只一二時，而從事革命者實七八時」。一八九四年夏季以後，中山先生開始奔走國事，就不再懸壺施診。甚至自身偶有不適，亦往訪當地著名醫生就診，決不自輕用醫藥。一九〇六年，在新加坡時，革命同志或有請孫先生診治，孫先生必笑答：我的醫術忘記已久，如何可為你們診病！

國父 胡適 陸仲安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建國方略」刊行後，四川崇寧縣羅仁普上書孫先生，自言「耕讀之暇，研究醫學」；請教先生：「科學家所謂元子者，是否為先天真一之炁？元子之知，有無等級？太極動而生電子，科學家能否把太極收服來看？方士所創之燒煉，究竟到底能否得長生藥？道家燒煉與方士燒煉有無分別？」中山先生當批復：「代答：欲知此種新理，須從物理化學用功，不得從古說附會」。先生篤信科學由是可見一般。

民國十二年秋，中山先生與許世英等同遊韶關南華寺，見六祖肉身，臂肘缺壞。中山先生曰：「此僧立數千年之志，而軀殼可憐」。劉成禺乘機打趣：「先生醫學最高，何不為此僧醫之」！譚延闓因又笑語：「先生以小兒科著名，慧能非小兒；且陳死之人，又何必醫」？許世英也亦莊亦諧說：「先生主義，起生民而生死肉骨之者也，死者當受其賜」。孫先生曰：「容我改四書兩句！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則曰：未治生，焉治死」？更可見孫先生之平易近人，故革命黨同志可以醫學為笑語。

民國十三年冬，中山先生北上途中受風寒刺激引發肝癌，入北京協和醫院。西藥診治，久不見效。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張人傑主張改請中醫治療。時有人荐陸仲安，並說陸曾為胡適治病。李石曾乃往請胡向中山先生進言。胡初以推荐醫生，責任太重，頗有難色。嗣經汪兆銘等力言；以挽救先生生命為第一，而孫先生平時對胡甚客氣，換一生人往說，或可採納。胡乃偕陸同往。

胡先入臥室進言，先生對胡曰：「適之！你知道我是學西醫的人！」胡說：「不妨一試！那對與否再由先生決定。」孫夫人乘機急請陸入室，孫先生神情悽惋，伸手供陸把脈而以面向內望。其篤信所學由此可見。

自這一事實發生，許多傳說因之流佈，近年在臺灣仍甚。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十二日，胡適博士曾寄信余序洋君有云：「你看見一本醫書上說：我曾患糖尿病，經陸仲安治好，其藥方爲生薑四兩等。我也曾見此說，也曾收到朋友的信，問我同樣的問題。其實我一生從沒有得過糖尿病，當然沒有陸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陸仲安是一位頗讀古醫方的中醫，我同他頗相熟。曾見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腎臟炎。但我從沒有聽見陸君說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謠言的中醫，從不問我一聲，也不問陸仲安，竟筆之於書，此事使我甚憤怒！」民國四十九年一月十二日，胡適博士又爲這一傳說寄信劉崎將軍：「我從來沒有患過糖尿病。報紙所傳，全是瞎說。關於我患糖尿病的傳說，最早見於某種中國醫學辭典。我也曾屢次更正，但傳說至今未絕，我也就懶去更正了。隨時更正無稽的傳說，頗似「與影競走」，永不能斷除的。此次因先生見問，我可能試再作一次更正」。

陸仲安爲 國父診病，距今不過四十六年。事實具在，不意一般傳說竟轉而以胡適博士爲主題，雖經多次更正，許多人却不察事實而歡喜聽信謠傳。這說明我們一般社會沒有認真態度和是非觀念。這如何能生存於現代世界呢！

陸仲安與胡適之病

胡適之在所題「秋室研經圖」中的詞句，祇說「我自去年秋間得病」，什麼病？沒有提到，自不能硬指是糖尿病，但經馬幼漁介紹陸仲安診看後，他的病「竟好」了，所以寫了那些話，其涵意也是希望中國醫與藥的真價值，能因科學的化析而闡明出來，對醫學有更大的貢獻。總算寫得很得體。

不過胡是新文化大師，他的病特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俞鴻賓把藥方刊錄在丁福保主編的中西醫藥雜誌上，無異對「中國醫藥就是不科學的代表」的見解，加以否定，同時更不免有「爲中醫中藥張目」之嫌，而認爲被歧視的中醫師更津津樂道，其實「墨守」和「抨擊」，皆兩失之，中藥中「當歸、麻黃」等等，不是經過化學分析而成爲醫療新藥了嗎？

據傳：胡適之的病，「最初發現有糖尿的現象。住進協和醫院之後，經過三十回的便尿化驗，三回的血的分析化驗，七日的嚴格的食物限制，最後診斷報告，不是糖尿病。」胡曾在努力週報第三十六期上，登一則啓事說：「此次診察的結果，已斷定不是糖尿病。這一層

使我很安慰。承各地朋友慰問，十分感謝。」這一則啓事裡，還是沒提到什麼病，怎樣治愈，因此便被作爲「糖尿病是被中醫醫好的」反證。

民國十八年，「廢止中醫案」發生，全國中醫紛紛起抗爭，推了謝利恒蔣文芳隋翰英張梅庵陳存仁等一些人，代表到首都請願，而陪這些人進京的聯絡人，就是陸仲安，那時陸氏應李石曾先生之邀，入中西療養院，在滬應診，在旅邸中，閒談近代名人診病經過，自然也談到爲胡大師治病，及推薦爲「國父擬方經過，並把胡題「秋室研經圖」的話，述給大家聽了。現在這些人還有健在的，所言自亦有據，只是中醫每因見解分歧，好用「五行」「君臣」等字眼，使人感到過於玄妙而已。

但胡適之的糖尿病，一直在被人無意的傳說着，寫信向他詢問藥方的，仍是不少，四十九年初，劉峙曾向胡函詢，胡同了一封信，原文云：「經扶先生：我從來沒有患過糖尿病，報紙所傳，全是瞎說。竟勞先生函問，使我不安。關於我患糖尿病的傳說，最早見於某種中國醫學辭典。我也屢次更正，但傳說至今未絕，我也懶去更正了。隨時更正無稽的傳說，頗似「與影競走」，永不能斷除的，此次因先生見問，我可能再試作一次更正。胡適敬上。四九，一，十二夜」。胡大師否認有糖尿病，和所題「秋室研經圖」的話無關，其實他所辯是

病，對中國醫藥的眞價值，沒有意見，他還是想像有一天有「試驗室研經圖」呢！惜乎他不及見了。

陸仲安與胡適之病

到達上海即與蔣同往謁中山先生。這是胡適第一次謁見中山先生。這次會見對中國現代史的方向極具重要意義。

自陳獨秀被捕，李大釗走避，陳李主編的「每周評論」遂於民國八年六月十五日起由胡適負責。六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每周評論」內容，胡更大加改革，新開「論說」一欄，且特撰「歡迎我們的兄弟——星期評論」。七月二十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刊載胡適撰「孫文學說之內容及評論」一文，一再強調：「孫文學說這部書是有正當作用的書，不可把他看作僅僅有政黨作用的書。中山先生又做了一種建國方略，是一種很遠大的計劃。」同時，胡又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是年十二月，胡又於「新青年」雜誌作進一步說明。都是針對李大釗等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而言。對梁啟超「新學社」主辦的「解放與改造」論調也有批評。

其時，「建設」雜誌第一卷第一號及第三號先後刊載胡漢民撰「孟子與社會主義」及「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研究」，一再贊揚「胡適之教授著中國哲學史大綱，把前八世紀到前七世紀叫做詩人的時代，很有卓識」，「胡適之說：『孟子的政治學說含有樂利主義，萬無可諱言的』。從大體看來，這話確是不錯」。從此，以文會友，南北呼應。胡適、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又通信討

論古代井田制度有無問題，刊載「建設」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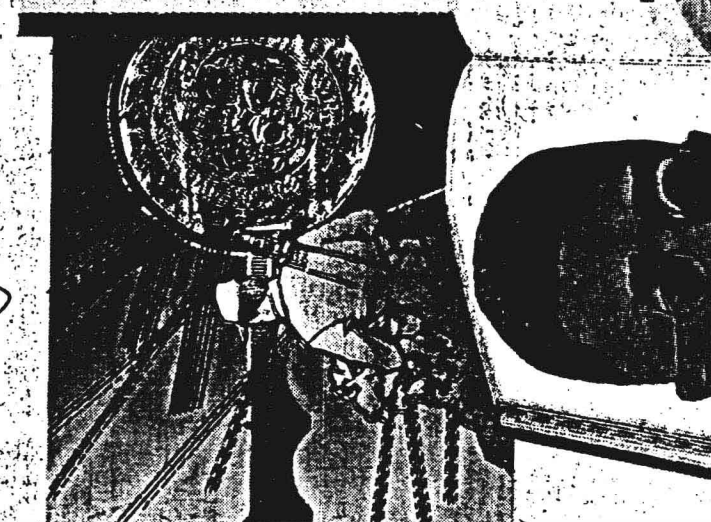
民國九年五月四日，即「五四」一周年紀念，胡適與蔣夢麟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從今以後要注重課堂裏、操場上、課餘時間裏的學生生活；只有這種學生活動是能持久又最有效的學生運動」。胡、蔣且明白指出「學問的生活」並不限於從前的背書抄講義的生活。希望全國大學中學生注意：（一）、注重外國文。（二）、注重觀察事實與調查事實。（三）、建設的促進學校的改良。（四）、注重自修。至於團體生活，如各校學生會、自治會、各校聯合會，應注重世界通行的議會規則。這就是指中山先生的「會議規則」（後改名民權初步，為建國方略中之一部份）。

是年十二月十六日，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請南下，擔任廣東教育委員長。自上海啓行南下時，陳致信胡適：「南方頗傳適之兄與（陶）孟和兄與研究系（梁啟超）接近，且有惡評」。李大釗致胡適信亦云：「現在我們大學一班人，好像一個處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學各系都想勾引我們，勾引不動，就給我們造謠，還有那個國民系看見我們爲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醋意」，事實上：胡適自閱讀建國方略、孫文學說後，立場顯明堅定，很崇敬中山先生；胡漢民、朱執信等也於「建設」雜誌公開贊揚胡適。而陳獨秀、李大釗致胡適竟故意製造相反謠言。陳到粵後又寄信胡適表示：「我很想你來廣東一遊」。但兩人左右方向已異，祇有分道揚鑣。



那有先生不說話？

殘存日記中的 愛國者





對日本，傅斯年主張軍閥主義，但胡適力持慎重。二十二年「塘沽協定」，傅斯年極力反對，胡適却認為「一八七一年法國割地兩省給普魯士，過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國家的生命是千百年，萬年的生命。」「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候四十八年，萬年，在一個國家的千萬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十八年算得什麼？」

理智的愛國主義

胡適的理智而冷靜的性格，形成了他做文章、做學問的基礎。他認為大丈夫的條件，除了「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威武不能屈」外，還得加上「一條——『時勢不能動』。光顧時勢是不成的，要先通過自己理智而冷靜的判斷才成，得先通過自己內心這一關：『我們不說時話，不唱時髦的調子，只要人做開成見，有事實，因為我們深信只有事實能給我們真理，只有真理能便我們獨立。』」

當他聽說江蘇人「那一幫有些人喜歡獨立評論，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調」的時候，他解釋：「其實『高調』和『低調』都不是適當的名詞。在我們的眼裏，有許多所謂『高調』都只是獻媚於無知羣衆的『低調』。我們自己說的話，別人總管說是『低調』，我們自己倒往往認為很『高』的調子。所以平心說來，調子沒有什麼高低可說。所可說的是：說的話是不是用我們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結果？說話的人是不是願意對他的主張負責任上的責任？」

關於「道義上的責任」，他反覆說明：「孔子會說：『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言之必可行也，這就是『無所苟』，這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話負責任。……作政論的人更不可不存這種『無所苟』的態度。因為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矜持謹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言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負得起這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

正因為「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正因為「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話不能亂說，不飽人云亦云。通時變，要在事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想通以後，要有勇氣站出來，批評別人的高調或低調，馬自己是「漢奸」！

朱文長的「海潮集」裏，記着國難當頭時候，北京大學的一場集會——

「就在校長那次召集的學生大會上，我們見到適之先生的氣度和他那種民主精神。當時他繼孟部先生之後上台講話，一開口，台下就起了騷。反對他的（多半是左傾學生），噓聲，嘶叫，用喧鬧來蓋住他的演講。聽他的（多半是右傾學生）用更高的聲音來維持秩序，來壓制反對者的喧嘩。頓時會場上緊張起來，形成了對峙的兩派，他的聲浪也就在這兩派的叫聲中起伏着，斷斷續續的送入我們的耳鼓。這是兩派口裏心裏的動搖，但反對他的那些左傾人却

主義者」深通大勢，力持慎重，知道戰而不勝，倒楣的是自己國家。可是毒國陷淪，非戰不可，李鴻章只好戰。結果賠款割地，丟了台灣。李鴻章被日軍刺死，血濺滿面，費盡唇舌，力爭國權，回來後的代價是伸出頭來的那些「狂熱主義者」一陣臭罵——「李二先生是漢奸！」

先生有話那堪說

盧溝橋事變的發展，使胡適的「不主戰」態度面臨考驗，他感到「等候四十八年」的基礎，已經根本動搖。所以他在最後兩期的獨立評論裏，主張「必須抵抗」，主張「不能有所顧慮」，不再主張妥曲求全。

但是，事變的發展，談話的進行，一再「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且得知中國有把握的底價只不過一年半載的時候，他的理智與冷靜發酸了，他還是在開拔尋常的關口，不避誤會，試圖挽救現狀。

在南開大學著述後第二天（七月三十日），胡適有這樣的日記：

「到高宗武家吃午飯，在座的有蕭同茲、程潛波、裴復恆。此皆南京之青年智識團也！」

「我們深談國事，決定了兩事：①外交路線不能斷絕，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②附機甚迫切，須有負責任的政治家擔此大任。」

「我打電話與布魯，叫他做駐英之臣，要努力做抗戰時期軍人在街頭演說的情形。」



匡過補闕的事。」

第二天，七月三十一日，蔣委員長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當天中午，他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等吃飯。在席上，蔣委員長表示決定抗戰到底，他估計至少可支持六個月。張伯苓一頭一個舉手贊成，這位南開大學的老校長，流着眼淚非常堅定的說：

「南開是被日軍燒掉了！我幾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國家有辦法，能打下去，我頭一個舉手開！」

這時候，希望能夠挽救現狀的胡適，感到很難說話，不便說話。他只提出一個建議，建議蔣委員長影響南京、上海等地的輿論界，不可在報紙上攻擊

蔣委員長最的「蔣先生約在座者有

「蔣先生官和之。

「我不便就外交路線，線不可負責任，並有

找他談話。」

「下午汪精衛宗武來，我

宗武談甚詳。

「我們此時，其難無出

手

胡適所以如

看法最接近，

的外交家，乃

事實上，胡

適的真相因

原來在七七

不。當時日

。當他不告

本國軍人，

可見他們根

「亂」的說

北目的主要

地是參謀本

是國。中國

近衛首相

兩派意見，

的幸內大將，

便很快的開

部最的壓力

杉山陸相擠

不可收拾了。

近衛首相在

故事：日本

他要打到南

「陸軍是宋

杉山陸相

湖一帶就

可是事實

口！近衛回

只是從他

節制，他們

日本當時

族的近衛

能回天，可

律，事變後，

樣的建議：

「事他至公

西安事變見聞 (二)

王覺源

學術界胡適等呼聲

全國學術文化界，識見深遠，最瞭解國內外大勢，深明中央國策方針，服膺 蔣公賢明領導的人士，當西安事變發生之初，即紛紛批判張、楊，主張制裁叛逆！如胡適先生，係全國學術界的領袖，亦國際知名的學者。回國未久，即逢此變。當即發表「張學良叛國」一文，說明國際與國內情勢，剖陳情理與利害，娓娓而談，繪聲繪色，詞嚴義正，浩氣凜然，尤足以代表全國學術人士的呼聲！文云：

「我剛從海外回來。我在國外，眼看見美國的輿論對中國的態度在最近幾個月之中逐漸好轉。到十月以後國家的統一形態更顯明了，對強鄰的態度更嚴正了。十一月九日美聯社的社長何華德先生 (Roy Howard) 從馬尼拉發出一個長電，對新興的中國表示驚異的贊歎。他說：『對這個更生的，統一的中國，歐美人的評判必須改變修正了。向來外國人認為不可能的統一，今天已是一件無疑的事實了。』

「我自己也抱着這樣的樂觀回家，萬不料回

國剛剛十二天，就遇着了張學良在西安叛變劫持統帥的惡消息！我個人精神上的大打擊自不消說；全世界的震驚，我們的國家民族在國際的地位驟然低落，只有我們剛從國外回來的人才能充分感覺到。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見人，不能開口說響話了！

「張學良和他的部下這一次的舉動是背叛國家，是破壞統一，是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這是毫無疑義的。最奇怪的是今日還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於張學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國家，必是無知無識。居心危害國家的人，唯恐國家不亂，因為只有紛亂的狀態之下他們可以在暈水裏摸魚，達到他們危害國家的目的。那種人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為他們的頭腦早已硬化了，什麼話都聽不進去。至於知識幼稚的青年，他們本是抱着愛國熱誠的，只因為情緒太興奮，忍耐心太薄弱，不明瞭事實，總感覺到政府對外太軟弱，總疑心到政府的領袖有對不住國家的心思。這種錯誤的感覺到現在應該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戰，所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齊整的步伐，充實的力量。性急的

青年雖然看不到這一點，我們的強鄰可早就明白了。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現的所謂『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說：

「要之，蔣介石及其一黨與日本帝國之關係，帝國屈伏乎？抑帝國打倒彼輩乎？」

「我們的青年人應該仔細想想這幾句話的涵義。我們的強鄰早已認清 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們處心積慮要打倒那個力量。所以凡危害那個力量的行為，都是自壞我們國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們自己的國家，戕賊我們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國禍國。」

「特別是在這個綏遠前防已開始作戰的時期！全國的人民應該明白：這回綏遠的作戰是第一次由統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領導的戰爭。中央的部隊已到了前線，軍政部長陳誠，已受命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了。這回作戰的第一步計劃當然包括三個子目：第一是綏北綏東的肅清，第二是察北察東的收復，第三是冀東的收復。正在這第一個子目還沒有做完的時候，正在陳誠次長受命指揮的第二天，張學良忽然造反了，把一個關係全國